

向迫害說不 還社協公道

□李繼亨



議論風生

在反對派極力催谷下，元旦「倒梁」遊行只錄得不到四萬人數，令人大跌眼鏡。在反對派口中，梁振英不是早就被市民唾棄？何以出現這種「與事實不符」的情況？或許要為遊行人數稀少的尷尬尋找藉口，反對派竟然向一個普通的社區組織開刀，指他們沒有參加遊行是因為「收了錢」，並由此無限上綱到，指稱所有沒有參加「倒梁」遊行的市民都是「被人收買」。這種近乎政治迫害的做法，竟然會發生在自命民主自由的反對派身上，真叫人感到驚奇。

其實遊行人數的多寡，並不一定代表真正的民意。在西方社會，每年遊行示威次數與人數，多到可以嚇死人，但真正能對當政者起到威嚇作用的，少之又少。原因在於，絕大多數的遊行都是經政黨或政治人物發動的，當中有太多的私人政治利益瓜葛，公衆不願意如此愚蠢地成為政客利用的棋子與籌碼。西方社會如此，擁有成熟公民社會的香港又何嘗不是。畢竟，聲大不代表擁有真理，沉默不代表盲從。

但儘管如此，反對派仍然視遊行人數的多寡，

來作為政治行動成功與否的唯一證明。因此，「報大數」、「放衛星」的做法，就成了反對派慣用的手法。明明只有三五千人參加的遊行，往往會成為三五萬。而根據港大的核査，元旦遊行人數只有三萬，到了主辦者口中又會成為十三萬。如果說政治人物誠信應放在所有特質中的第一位，那麼反對派遊行主辦者們，一次又一次地「造假」，又是否一種誠信的行爲？

反對派「殺雞儆猴」之舉

當然，並不是說三萬人遊行就不重要，也不代表政府可以忽視，但如果說這三萬人代表七百萬人中的其中一把聲音，那麼更多認同梁振英而又沒有參加「挺梁」遊行的市民，他們的聲音是否同樣應獲得社會應有的尊重。

人數之爭其實並無多大意義，反對派也應當明白其中道理。但或許是此次遊行人數與他們心理預期有太大的落差，迫使他們要採取一些行動，來解釋這種現象，以免日後過於尷尬無法向幕後主使交代，於是便從遊行爲何人甚少、挺梁遊行人數爲何多，這兩個問題來作文章。在反對派口中，前者是由於有些團體「收了錢賤跪」，後者則是由於建制

派「收買人心」。一增一減，於是元旦遊行人數自然不會多。經此解釋，大概反對派幕後的勢力應當「收貨」了吧。

爲了增強這種理論的說服力，反對派喉舌媒體於是拿「香港社區組織協會」開刀，編造種種所謂的證據證明，指他們拿了新世界的巨款云云。更有甚者，某電台女名嘴，公然向該組織的負責人作出政治指控，指責社區組織協會不參加民陣遊行係因爲何喜華做了「梁粉」，還擔任埋扶貧委員會成員，質疑他們已經變成建制派。

儘管該負責人已經清楚解釋，但主持人仍然咬住不放，迫使她在天氣電波中作出憤怒還擊：「係咪唔參加遊行就唔實踐公義，唔知香港點解變到咁。你哋簡直係政治迫害、白色恐怖、迫害街坊，好失望！」這番話實際上道出了許多香港市民的心聲，香港何時成為如此極端的社會？除了支持與反對外，竟然容不下任何其他聲音？

向幕後老闆「交代補鑊」

社區組織協會另一負責人何喜華，日前接受訪問時表示，他們一直放棄監察政府的工作，不參與遊行純屬街坊意願，認爲可給予時間梁班子施政

，又指過往也不是每年參與元旦遊行，「七一遊行就一定會去！」他表示，協會也不滿意梁振英無清楚解釋僱建事件，應盡快向公衆交代，「但不應由單一方面，決定特首是否需要下台」。

一個年年都參加「七一」遊行的社團團體，竟然由於沒有參加反對派的一次遊行，就被打成對立派，甚至進行百般的政治侮辱，如此做法與數十年前內地的「文革」做法有何區別？如果說社協沒有參加遊行是因為被人收買，那麼零三年參加遊行的五十萬名市民，是否也是因爲被人收買了昵？

每天高叫自由民主的反對派政黨，何以如此迫害一個普通的社區組織？

一方面是「抹紅」，又一方面則是「栽贓」。爲了攻擊「挺梁」遊行，在反對派喉舌報章的造謠下，整個遊行的市民都成了「爲錢而來」。姑勿論發生在遊行其間的「派錢」一事是否屬實，將個別當成全部，意圖抹殺「挺梁」遊行，這種做法本身已脫離了事實本身。

更何況，「栽贓嫁禍」的疑雲至今未消，反對派如此迫不及待地作出指控，是否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他們的心虛？他們每年從黎智英身上獲得數百萬的巨額捐款，這又是否「被收買」的證據？而遊行當天，黎智英鬼鬼祟祟地出現在隊伍當中，這又是否證明，他是在「監督」反對派，以觀察美國人的錢「用得其所」？

問題其實一點也不複雜，反對派由於遊行人數稀少，向社協開刀、栽贓挺梁遊行，無非是要爲自己「辦事不力」開脫。但這種伎倆騙得了反對派的幕後老闆，又如何騙得了香港市民？

殖民旗傷害國人感情

□華生

言論自由既是權利，也有責任。雖然社會崇尚言論自由，但是高舉類似殖民地時期的旗幟，傷害內地人與香港人之間的感情，更威脅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以至社會的穩定，該行爲應被嚴詞譴責。人們有言論自由，但是該自由不能無限延伸。因爲該自由不受限制，可能對其他人帶來傷害。最明顯的例子是2005年一位丹麥漫畫家在報章刊登了有關穆罕默德的漫畫，被伊斯蘭世界認爲是褻瀆行爲。多個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有不少民衆遊行示威，購買丹麥貨品等活動接踵而來。西方多份報章都以捍衛言論自由爲名，相繼刊登有關漫畫，令風波越演越烈。

風波刺激伊斯蘭國家的激進力量，引起社會動盪，令這些國家白白蒙受經濟損失。丹麥以至整個西方的國家的國民的人身安全亦受到更大的威脅，成爲恐怖襲擊的目標。更重要是，伊斯蘭國家與西方國家的嫌隙更深，兩地人民的誤解更大，令不少協商友好的努力都付諸流水。

對於言論自由可能帶來的傷害，在世界多個國家都有所警惕，甚至訂下明確界線，例如1994年德國便訂立《反納粹與反刑事犯罪法》，禁止任何宣傳納粹思想、使用納粹標誌的行爲等。元旦遊行中，香港有示威者高舉類似殖民地時期的旗幟。雖然示威者辯稱該旗幟並不是什麼「龍獅旗」等云云，但是相信任何香港人看到，都會聯想爲殖民地時期的旗幟。示威者還要選擇在中聯辦外升起該旗幟，「挑機」意味更濃。事實上，示威者的組織以「我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爲名，已令國人不安、憤慨。

言論自由受到尊重，但是該自由並不能無限延伸，令國人以至整個國家的利益受損。高舉類似殖民地時期的旗幟，只會傷害內地人與香港人之間的感情，引來誤解。尤其不少內地人不明白，爲何自香港回歸以來，國家多次推出惠港政策，部分香港人會作出如此傷害祖國的舉動。更重要是，中國是一個面積龐大、人口衆多、民族種類極多的國家，並有領土問題尚未完全解決。這種踩鋼線的行爲，無論是有意或無意，但實際效果是挑動神州大地各民族群衆的情緒，應受嚴詞譴責。

承祖父傳統 求國際理解

但1994年金日成逝世，金正日接班後，這一重要做法被徹底捨棄。每年元旦，金正日不發表新年獻詞，而是改爲由黨、政、軍三家報紙發表聯合社論，提出當年的奮鬥目標。不僅如此，金正日主政近20年，沒有面對群眾發表過任何講話，他的著作雖然不少，其中除論文外也有講話，但是在什麼場合以什麼方式講的，從來沒有公開過，給人以「神祕」的感覺。

過去幾十年來，平壤燃放煙火多在大慶之時，或是共和國成立周年紀念，或是朝鮮勞動黨成立周年紀念，一般則很少。1978年9月9日是朝鮮國慶30周年，鄧小平率中國黨政代表團應邀參加慶典，我有幸陪同前往。那次平壤舉行了大型煙火晚會，金日成陪同鄧小平觀看。這次新年燃放煙火是罕見的。金正恩迎新做法，繼承了祖父的傳統，又有了新的發展。

金正恩的新年獻詞，重點放在發展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他號召人民以征服太空的精神建設強盛國家，強調發展經濟和提高人民生活是首要任務，要發起總突擊戰，振興關係人民生活的部門，增加生產，使人民得到更多實惠。他特別強調農業和輕工業是今年的主攻戰線，要集中一切力量，一定要佔領農業生產高地，同時大力發展消費品生產，豐富人民的物質生活。

金正恩還談到對外關係，強調對結束敵對狀態，早日實現統一，朝鮮擺脫對峙十分重要。尊重和履行南北共同宣言，改善南北關係，將是新世紀繁榮發展的里程碑。這分明是向韓國當選總統朴槿惠發出的呼籲。他還強調，將與友好對待朝鮮的世界各國發展合作關係，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實則是重申願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改善和發展關係立場。金正恩接班一年來展現了不少新風，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也得到各國媒體的基本認可。美國《時代》雜誌選擇2012年世界名人，金正恩已列其中。這次金正恩藉新年之機，恢復金日成當年的做法，發表獻詞，舉行活動，無疑是朝鮮爭取國際理解、擁抱國際社會努力的一部分。

作者為前資深外交官

政改諮詢不必操之過急

□周八駿

有人一方面為提前展開雙普選政改搖旗吶喊，一方面敦促中央的香港政策回到2003年「七．一」遊行之前狀態，頗自以為得計。但是，他們高估了自己而低估了中央。十八大關於新時期香港工作的大政方針字字如鐵、擲地有聲，中央關於香港中聯辦最高人事安排的出人意表，足以展示中央對於香港政局演變洞察秋毫，對於「一國兩制」與時俱進將會遇到困難既充分估計又精心應對。



知微篇

以往處理2007年、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以及2008年、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經驗表明，2016年第六屆立法會產生辦法在2014年展開有關諮詢和立法程序，2017年第五屆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在2015年展開諮詢和立法程序，是合適的安排。即使將2016年立法會和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放在一起諮詢和立法，2013年也顯過早。但是，就在2012年快結束時，香港驟然冒出一股相互配合的輿論稱：2013年應當展開關於2016年立法會和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諮詢和立法程序，甚至揚言：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2020年立法會全部議席可由普選產生的前奏，必須與立法會普選方案捆綁。

主教反對派同提雙普選

這一回，香港的天主教會又與反對派政治團體擊鼓相應。

2012年12月24日，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發表2012年聖誕賀詞，開頭劈臉稱：「今年，我教區先後兩次向新一屆特區政府表達了期望，建議落實全民雙普選」。相比較，同樣信奉基督的香港聖公會大主教2012年聖誕文告，雖然也提及香港的立法與行政機關之間的矛盾，帶一絲政治色彩，但是，主要內容是道德關懷。

幾乎同時，民主黨改選產生新領導層，在2010年上半年推動2012年政改方案取得成功的時任民主黨副主席劉慧卿，在榮升民主黨主席後，立即擺出一幅強硬姿態：寧肯原地踏步，也不要假普選。有趣的是，在2012年政改一役中策劃「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公民黨，其新任主席余若薇既呼籲反對派「擁抱同一普選方案」又表示願意與中央談判。反對派兩大政

治團體相同的是，都提前揭開雙普選開幕；不同的是，在策略上，2010年裝扮「鴿」的，而今以「鷹」的形象出現，當年是「鷹」的則塗抹「鴿」的油彩。

香港本地一家貌似獨立公允實則反對派吹鼓手的平面媒體，也以社評形式，推波助瀾，一方面，曲解、抨擊十八大關於「一國兩制」與時俱進的大政方針，一方面，將香港政治經濟社會問題歸咎「不落實雙普選」。

提前政改加劇政治掙拗

香港市民要清醒了：新一屆特區政府來不及就民生和經濟問題展開見成效的施政，反對派就將更複雜更困難的政改問題強加於香港頭上。反對派用心何在？是欲「香港號」巨輪不堪負重而下沉！

倘若特區政府不按反對派及其後台老闆的意願，2013年堅持以發展經濟和治理貧窮、房屋、老年人、環保等問題為施政重點，不列入不必過早列入的政改議題，那麼，反對派就將集中其全部力量，千方百計干擾和破壞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香港號」巨輪就將面臨「鐵達尼克號」的危險。

倘若順從反對派及其後台老闆意願，提前處理政改議題，那麼，香港社會就將陷入更加激烈的政治掙拗，社會就將進一步被撕裂，特區政府所有關於經濟民生問題的施政就將動彈不得，「香港號」巨輪也會遭遇「鐵達尼克號」的危險。

有人一方面為提前展開雙普選政改搖旗吶喊，一方面敦促中央的香港政策回到2003年「七．一」遊行之前狀態，頗自以為得計。但是，他們高估了自己而低估了中央。

十八大關於新時期香港工作的大政方針字字如鐵、擲地有聲，中央關於香港中聯辦最高人事安排的出人意表，足以展示中央對於香港政局演變洞察秋毫，對於「一國兩制」與時俱進將會遇到困難既充分估計又精心應對。

愛國愛港陣營必須勇於迎接反對派及其後台老闆向「一國兩制」發動的新挑戰。

2012年7月至9月，反對派及其後台老闆所炮製反對國民教育風波，本質上是一次「顏色革命」的預演。反對國民教育的目標是國家、是中央；有組織，有輿論，聲勢逐漸擴大，攻擊次第展開；最後，包圍特區總部，你不退讓他不撤退，風波達至高潮。特區政府全面退讓，風波驟然平息。

2013年，反對派及其後台老闆會否如法炮製逼特區政府提前展開2016年立法會和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諮詢和立法程序？

假如做這樣的退讓，那麼，反對派及其後台老闆就將「食髓知味」，以同樣手段來逼所謂真普選。

兩大陣營決戰日益迫近

樹欲靜而風不止。在「一國兩制」問題上，是「拒中抗共」勢力及其後台老闆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發起挑戰和攻擊，迫使中央審時度勢，相應調整落實「一國兩制」和貫徹《基本法》的各項政策措施。從2003年「七．一」至今10年半，香港政治基本矛盾不斷惡化，愛國愛港陣營與反對派的鬥爭愈益激烈，正在迫近的是一場具根本轉折意義的決戰。

必須指出，即使愛國愛港陣營，也不是所有政治團體和個人都明白這一決戰的性質和意義。

不久前有人對於國務院港澳辦前領導人警告香港有人要獨立不以為然，以爲香港已然回歸，不可能獨立。

的確，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可能被人公開宣布獨立。但是，倘若雙普選議題被反對派及其後台老闆牽着鼻子走，那麼，香港特別行政區將會出現的變化，與「獨立」又有何實質性區別？！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突破「歷史周期律」值得期待

□屠海鳴



神州點面

中央和全國工商聯。民建中央主席陳昌智說，總書記談到了毛澤東主席和黃炎培在延安窑洞關於歷史周期律的一段對話，至今對中國共產黨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歷史周期律」的對話是什麼內容？這要從67年前的國內局勢說起。那是1945年4月，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毛澤東發表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主張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然而，當時中國面臨內戰危險，國內部分知識分子、民主人士在國共兩黨間進行了一次幹旋。6月，黃炎培、左舜生、章伯均、冷通、褚輔成，傅斯年等民主人士以個人身份訪問了延安。在延安的窑洞裡，黃炎培與毛澤東進行了一場對話。

重溫延安窑洞一場對話

毛澤東問：「在延安考察的感想怎樣？」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

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爲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爲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爲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爲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

毛澤東自信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儘管當年的毛澤東成竹在胸，但歷史的事實證明，毛澤東在有生之年，並沒有找到一條「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的可行路徑。「大躍進」決策失誤，「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錯誤批判，不僅沒有找到讓人民監督黨和政府的好辦法，連黨內民主也在個人權威面前妥協、讓步。更爲慘痛的教訓是十年「文革」，民主和法制完全被拋棄、被踐踏，連國家主席劉少奇也無法用憲法保護自己，普通百姓的遭遇更是可想而知。不可否認，毛澤東初衷是好的，他想探索一條不同於西方、也有別於前蘇聯的路子，但卻憑個人意志颯起了一場疾風暴雨。他的探索失敗了。

然而，「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的重大工程還遠

沒有完成。怎樣讓人民有效監督政府？仍有很多難題亟待破解。人大是監督政府的國家立法機關，政協是參政議政的重要平台，雖然近年在代表委員中增加了不少第一線的工人、農民比例，但草根階層意見上達管道還是太少或不太暢通。這樣，民衆往往無法有效監督政府，民意在找不到出口的情況下很可能集中爆發，釀成群體性事件。相信中共高層已經強烈的意識到了這種危險，改革原有的社會治理模式，也是勢在必行。

「讓人民來監督政府」

習近平上任伊始，南巡廣東，響亮的提出：「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這個「改革」當然不僅僅指「經改」，也包含「政改」。一個多月來，從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八項規定，到公開中共高層領導人的從政履歷和生活細節，人們普遍感受到了中國政壇吹來了陣陣新風。然而，這僅僅是開始。「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是一個大課題，有很多操作上的難度，還要綜合考慮民衆對社會震盪的承受力、對不改革的忍耐力。這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工程，領導者需要勇氣，更需要智慧。

習近平在走訪民主黨派時重提黃炎培與毛澤東的那段對話，他說至今對中國共產黨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信號，再次顯示了中共推進政改的決心和信心。中共能否在民主政治建設上實現突破、跳出「歷史周期律」，值得期待。

作者為香港僑界社團聯合會遠名譽會長